

资料建设： 构建中国当代史学术体系的基石

■行 龙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成为学界的共同话题。“从群众中搜集史料”，“走向田野与社会”，完善中国当代史资料分类体系，真正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正是构建中国当代史学术体系的基石，也是史学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中国当代史；学术体系；资料建设；史料存留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4)01-0015-07

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太原 030006)

中国当代史研究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破土而生，又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脚步而茁壮成长。近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在资料整理、理论方法、研究成果、人才队伍等方面都取得了足的进展，其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日益凸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滚滚洪流，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成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必须回答的课题。本文仅就中国当代史学术体系的基础性工作——资料建设，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不妥之处，尚祈指教。

一、构建“三大体系”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重大机遇

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为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提供了现实的重大机遇。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P478)}

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2](P44)}。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在五千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会前在视察国家版本馆时,他说:“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是我非常关注、亲自批准的项目,初心宗旨是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国家版本馆的主要任务就是收藏,要以收藏为主业,加强历史典籍版本的收集,分级分类保护好。”^[3]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尤其是在视察国家版本馆时指出的“加强历史典籍版本的收集,分级分类保护好”,对中国当代史的资料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当代史研究面临的另一个机遇,是学科体系的进一步明晰。长期以来,中国史研究以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分期,中国近代史的时段为1840—1919年,中国现代史的时段为1919—1949年。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分作两段。在国务院2011年最新颁布的学科目录中,将对1949年以来历史的研究,首次列入中国史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称之为中国现代史。而将之前定义的“中国现代史”(1919—1949)划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畴。如此一来,学界以往表述的“中国现代史”“当代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更为简洁的“国史”,都被统一称为中国现代史。这一学科体系的进一步明晰,表明中国现代史已经拥有了独立的二级学科地位,显示出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研究高度重视。只有进一步明晰了学科体系,名正才能言顺,这为中国现代史的未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也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诸多重大突破围绕着史料的发现与建设而展开。例如,20世纪以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等历史资料的发现,促进了相关学术研究的极大发展,也成为全世界的宝贵财富,其影响直至今日。就中国当代史资料而言,其遗存更为丰富、规模更为庞大、类型更为多样。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当代史料的重要价值,近来也有许多当代史料被整理出版。然而,目前来看,似乎尚未像其他史学研究时段那样建立起完善的资料体系。由于时段更为靠近当下,甚至对一些珍贵史料有所忽视。

就像梁启超在百年前所言:“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他还举例:“例如中日甲午战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侪欲求一满意之史料,求诸记载而不可得,求诸耆献而不可得。作史者欲为一翔实透辟之叙述,如《通鉴》中赤壁、淝水两役之比,抑已非易易。例如二十年前,‘制钱’为国家唯一之法币,‘山西票号’管握全国之金融,今则此两名辞久已逸出吾侪记忆线以外,举国人能道其陈迹者,殆不多觐也。”^{[4][P49]}当前学界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制钱、山西票号等研究已有丰硕成果,远非其时之情形。这得益于相关领域持续的资料建设工作。

中国当代史的资料也是如此。尽管数量庞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当代史资料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有些资料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有所遗失、毁坏,有些资料“零散”“琐碎”不被人们重视,而可资与文字资料互证的口述资料,因当事人的离开而无法弥补。因此,构建中国当代史料存留制度,大力开展资料建设,不仅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重大需求与中国当代史学科体系的明晰,既为中国当代史研究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也同时对中国当代史资料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系统、全面地构建中国当代史资料体系,才能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推进学术研究,掌握中国当代史的话语权,书写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当代史。

二、“从群众中搜集史料”

1990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是国内第一个以研究当代中国史为宗旨目标的研究机构。成立伊始,主要领导人即强调“必须掌握原始资料”,“从群众中搜集史料”,写出“真实、生动、可信、可读”的当代中国史。这一重要精神,应当成为构建中国当代史学术体系的原则遵循。

粉碎“四人帮”后,在制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规划的动员会上,首任院长胡乔木即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人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在他的推动下,1990年6月,当代中国研究所正式成立。胡乔木不仅重视当代史的研究,还为当代史的研究提出了系统的理论指导,他明确提出研究要有扎实的基本功:“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满足于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必须掌握原始资料,在这方面,确实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向导,而路则是要我们自己走的,究竟能走多远,要看我们自己付出了多大努力。”^{[5](P124)}对于党史研究著述中的有关问题,他主张“要用历史本身来解释历史”,而不要用会议的决议、文件来解释历史。“有些不那么重要的会议,情况写多了,引述了一大堆会议的文件、材料,读者读起来没有多少兴趣,像这样的内容就不要写了。”^{[6](P246)}

邓力群直接领导当代中国研究所时期,开始着手组织编写上百册的《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编写过程中,他就特别强调整理挖掘各类材料。他说:“《当代中国》丛书在编写过程中从各个方面积累了大量可信材料,可以成为国史研究的奠基石,要充分利用。另一方面,要整理和挖掘档案材料,包括地方的、部门的、国家的档案。要充分利用和整理档案馆现存的材料,凡是档案馆出版的、出版的档案,都把它们集中起来。还要把国内已经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书集集中起来。国外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材料、书籍、文章也要搜集起来。如果还没有翻译过来,要组织力量全文翻译或者摘要翻译。”^[7]

曾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的李力安,世纪之交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应当重视国史研究》的重要文章,重提胡乔木当年旧话,批评一些国史研究著述中的问题是“文山会海”,倡导要注重“从群众中搜集史料”。他说:“现在出版的一些国史方面的书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文山会海’。往往是反映上层领导机关的情况多,反映地方的情况少;写会议写决议写领导同志讲话多,写决策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情况少;写领袖等上层人物的活动多,写广大人民群众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实践活动少。这样的史书难以真正反映历史发展的全貌,实际也是研究与现实脱节的一种表现。我们的国史稿,决不能只是中央的决策,而应该是部门史和地方史精华的有机融合,是领导决策和群众实践紧密结合的历史。国史研究工作者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面向群众。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特别是广大群众都熟悉当代历史的发展情况,从群众中搜集史料,或者是向某具体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核实情况,再经过史学工作者的综合、升华,这样写出的历史才会是真实、生动、可信、可读的。”^[8]

从以上三位人物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搜集、整理原始材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同时可以看出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存在的“用会议决议和文件来解释历史”的弊端,也就是学界长期以来感受到的当代史研究多重视上层、国家而忽视地方社会的弊端。

三、“走向田野与社会”

资料建设在学术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说,学科体系是构建“三大体系”的基础,那么,学术体系就是构建“三大体系”的核心。一般而言,学术体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有关的思想、观念、原理、理论、观点等层面;二是研究方法、研究资料及研究工具等层面。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内核和支撑,一定程度上讲,学术体系的水平决定着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水平。资料是研究的基础,资料的丰赡或缺失对于研究方法和理论是否得当与正确具有一定的意义。只有掌握了当代中国实际的丰富资料,才能够以当代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才能够提出具有主体性与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才能够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当代中国学术体系。

有论者指出,当代民间文献史料(包括文件、账簿、信函、日记、笔记等),因其反映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家庭关系、个人境遇等,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如重大日记、笔记之类的史料,对于研究社会心理是非常难得的资料。同时也要考虑到,因为记载者难免会受到政府的影响,致使这类史料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在运用时需要与历史事实相对照;而且,这类史料通常以大队、村社为单位,资料分散且个案性强,所以还需要注意是否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意义。^[9]确实,民间史料获得不易,需要注意其典型性和普遍意义,但是从近年来相关的研究看,在这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对集体化时期农村账簿等资料的研究,以及对人民公社制度、农户收入等较为系统的研究,已取得丰厚的成果。为此,进一步拓展对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实现官方权威文献与民间文献史料的有效互动,展现更为丰富、多面、立体的中国当代史,仍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学术空间。^[10]

有关中国当代史研究及其资料建设的相关问题,笔者曾参加过几次有关杂志组织的笔谈^①,结合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此方面多年来的工作实践,谈过一些我们的想法和做法。重点在于强调“走向田野与社会”,“抢救式”地开展基层农村档案的搜集与整理,并从社会史的角度加强研究。现就2023年暑期在山西省太谷县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具体做法稍作叙述,以此就教于同仁。

首先需要交代的是,自2003年开始,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即注重搜集整理基层农村社会档案资料,迄今已过去整整20年。最初,我们是“从家乡做起”,利用对家乡人熟地熟的条件进行搜集工作,也从旧书市场搜集到少量档案,目前数量已相当可观。随着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当代史日益受到更多关注,一方面是大量基层档案资料的迅速散失,一方面是社会各界尤其是书商的“奇货可居”,我们的搜集工作在毫无专门经费支持的情况下感到越来越困难。最近这些年,我们调整工作思路,将“从家乡做起”转变为“地毯式的集体调查”。到目前为止,已对山西省昔阳、潞城、永济、浮山、绛县等县域进行过集体调查。

最近这些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集体调查工作停顿了一年。停顿期间,我们也在不断地总结反思过去的做法,更加注重调查前的案头准备工作。2023年7月初,学校开始放暑假,中心决定师生推迟1周放假,到太谷县开展集体调查。事前,由有关教师整理出:太谷县明清以来的各种县志版本,新旧太谷县各种行政图及交通图和文物分布图,集体化时代太谷县的典型村庄和模范人物事迹,有关太谷的重要学术著作如《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和《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太谷县卷)》等,甚至是太谷县境内的戏台、宗祠、晋商大族、庙会集市、碑刻等的分布。要求师生在进入前做好各类细致的案头工作。又请熟悉民间文献的教师做一个“调查手册”,提请师生了解调查程序、重点及注意事项。出发前,再次召开简短的动员会,明确由指导教师

牵头组成各自研究生为主体的8个小组,并强调安全、防暑等事项。笔者在动员会上曾讲到,集体调查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搜集到多少档案资料,“摸清家底”应当是调查工作的重点。哪些村庄资料已散失?何时散失?知情人是谁?哪些村庄有哪些不完整资料?哪些村庄资料仍保存完好?等等。都要“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能搜集回来更好,“摸清家底”也好。太谷方面的具体工作,已有教师3人提前到县城联系好住宿及下乡车辆,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事实证明,在做好事前准备工作的前提下,此次太谷集体调查相当顺利而有效。8个小组,无论在山区还是在平川区,都按照事先的安排有条不紊地开展了大量工作。1000多平方公里的太谷县内近200个行政村,几乎都留下了我们集体调查的足迹。搜集到手的资料也是丰富多样,举凡集体化时代的农村档案、地契房契(当地百姓称之为“圪敦簿”)、家谱族谱、摩崖石刻、村史村志、笔记日记、信函台账、小报简报,等等,“无奇不有,无所不包”。从集体调查的整体情况看来,山区村庄,尤其是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散村,资料相对较少;而平川地带的大村资料较多,保存现状也相对较好。有些平川大村和集体化时代的典型村资料保存相当完好,新式的档案柜、分类整理的档案盒、专门负责的管理员,一切都显得规矩整齐,相当完备。此次搜集到的太谷农村档案资料,既有多个村庄相对完整的系统资料,也有不甚系统完整的村庄资料;既有村庄签订协议允许我们带回的资料,又有不允许带走只可以拍照利用的资料;既有实物资料,又有影像资料,可谓收获满满。可喜的是,通过此次集体调查,我们基本摸清了太谷县的“家底”,为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奠定了一个基础。可叹的是,基层农村档案的存留情况十分堪忧,绝大多数村庄并无专人管理档案,有些村庄档案长期被湮没在早已闲置的旧大队部或旧庙,只有极少数原来的村干部和会计知道档案资料的存放地。水浸土掩、脆弱破损、残缺不全、丢失严重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震动。

这里笔者想强调的是,中国当代史的资料,尤其是基层农村档案资料,因为一直以来不在档案保存的范围之内,或有文件规定予以保存归档,但实际落实并不太好,已有相当数量的当代史基层资料散失而不见踪影,少量存世资料需要进行“抢救式”的搜集整理。只有“走向田野与社会”,下苦功夫进行“集体式的调查”和搜集,才能有所收获,才能一定程度上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研究的结合,才能传承优秀的中华地方文化,才能留住乡愁。或有论者认为,现今搜集的当代中国基层农村档案多为改革开放前30年的资料,且以村社为单位,个案性强而普遍性差,难以形成所谓的范式和理论。愚意以为,这是一种史学观的偏差。试想,如果我们不去抢救搜集整理此类资料,当代史研究何以反映基层农村的实际?若干年后,后人又会“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吗?他们从哪里寻找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档案和资料?历史学研究首先需要资料,这是历史学的定律,也是目前构建中国当代史学术体系的基石。任何范式和理论都应该建立在基本的资料基础之上,没有资料支撑的任何范式和理论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我们宁可下苦功搜集整理资料以为研究的基石,也不愿在空中楼阁里提出什么空洞的范式和理论。况且,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11](P111-112)}

四、关于当代史的资料分类

搜集得来的资料,需要分门别类。分门别类,条分缕析,目的是便于研究者检索查阅、综合分析。

一般而言,距今愈远资料愈少,距今愈近资料愈多。当代中国即现实的中国,中国当代史的资料较之古代不仅数量更多,而且更加纷繁多样。如何分类,诸家也有诸多看法,现在可以看到的诸如《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等即有不同的分类和标准。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文等著《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刍议》一书,该书专列“中国当代社会史史料概说”一章,其中一节“传统史料的编纂、分类和利用”,将传统史料按机构分为档案馆系统、文史资料系统、地方志系统、专业研究机构系统等“四大系统”。其中,专业研究机构系统又分为党史和国史编研机构系统、各业务条线的编研机构系统、专业学术研究机构系统等“三小系统”。李文在该节最后一段写道:“社会史档案汗牛充栋,卷帙浩繁,除以上涉及的档案搜集与整理系统外,中国当代史学者还应留心如‘两报一刊’这类时文报纸,以及如《华北建设》一类邸报,这些时文和报纸及连续出版物本身就是社会历史生活的一个记录。研究者还应拓宽史料的视野,有‘他者’的意识。海外机构作为‘他者’,搜集了大量反映1949年后中国社会的档案和文献。如美国和英国的解密档案,这些文献中有大量聚焦中国社会的史料。”^{[12](P186-196)}应该承认,这是笔者迄今看到的从社会史角度对当代史资料进行分类最为系统而全面的叙述,最后一段提到的有关问题,也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该书接下来的一节为:“积档成山:社会史视角下对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涉足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第一批学者就开始了他们很有特色的档案和资料的搜集工作”,其特点是“视角向下,走向田野,关注基层,自下而上”。^{[12](P196)}在接下来具体介绍“农村基层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时,首先提到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团队。其实,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各家均有自己的特色,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也是处在不断地摸索讨论过程中。虽然,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到山西境内300多个村庄(包括2023年调查的太谷县)的档案资料,但“从具体内容来看,各个地区都有自身的体系和特点,或以个人档案突出,或以村庄组织活动突出,或以较为完整的账册突出,或以极为详细的经济活动的分类统计数字突出”^{[13](《总序》,P7-8)},很难确定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不过,整体看来,“目前中心所藏档案资料可分为八大类,分别为支部群团文件、行政文件、上级文件、科技档案、个人档案、财务档案、历史档案、内部资料以及其他类型的档案资料”^{[13](《总序》,P8)}。

我们认为,因为不同时期建档的具体要求不尽一致,现存不同时期的农村档案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以山西为例,1962年有山西省档案管理局的《关于建立健全农村人民公社文书、档案工作的意见》;1963年有山西省委的《关于生产队和生产大队普遍建立档案的通知》;1976年有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地市县级机关清理鉴定档案工作办法(草案)》《人民公社建档工作办法(草案)》以及《生产大队建档工作办法(草案)》;1980年对1976年的三个《办法》进行修改,省委办公厅又发布了《关于档案工作三个管理办法的通知》,20世纪80年代后的山西农村档案以此为准绳建立起来。“这一规范化、制度化的进程长达19年时间,可谓漫长。”^②正是由于农村文书和档案的管理与分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要求,因而“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坚持的分类原则是“因地制宜”,即按照不同村庄现存档案的分类而分类,有些保存较为完整且分类明晰的农村档案,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再分类。如此,既保留了档案的原貌,又省去不少工力,何乐而不为?当然,对于那些非系统完整的农村档案文书,我们会按照以上所示“八大类”进行重新分类和整理。新近出版的《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丛编》第一辑即为一个式样,今后仍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通古今之变”,司马迁写《史记》“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14](卷一六《杂说上》,P44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中国当代史研究,恰逢其时地迎

来了大好的发展机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成为学界的共同话题,“从群众中搜集史料”,“走向田野与社会”,完善中国当代史资料分类体系,真正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正是构建中国当代史学术体系的基石,也是史学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①参见:行龙《“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资料革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工作》(《河北学刊》2012年第2期)、《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当代史》(《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从社会史角度深化国史研究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②参见张俊峰《文本的历史:集体化时代山西社队文书档案的形成、特征及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2期),收入行龙主编《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9页。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01).
-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5]胡乔木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7]刘国新.尽心尽力完成这项崇高的事业——邓力群与当代中国研究所[J].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3).
- [8]李力安.应当重视国史研究[N].光明日报,2000-09-29.
- [9]王爱云.如何正确运用中国当代史料刍议[J].党的文献,2014,(6).
- [10]金光耀.新中国史研究三题[J].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4).
- [11]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2]李文.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刍议[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
- [13]马维强.上吾其公社卷:第一册[A].行龙.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丛编:第一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 [14]史通通释[M].(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王立霞】